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Research on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ast Decade

—Based on CNKI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CHEN Haipi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In the past decad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the academic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e fields of protection, disse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iz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research on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ast decade.

[Method] This study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search the core journals related to the digitiza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d in CNKI from January 2015 to March 2025. Through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t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cholars in this field in the past decade.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research on the digit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shown a research evolution trend of "data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 "ac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fiel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focuses on themes such as "living inheritanc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onclusion]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ization research will focus on cultivating a compound tea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lents, forming a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circle, expanding the digital inheritance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ilding a goo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cosystem, integrating and building a publ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 of the new era well.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Knowledge Graph; Communication

ORCID: 0009-0000-8469-326X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Haiping; chenhaiping40@gmail.com

Funding: East Sichu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on Digital Imaging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amen Wus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azhou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fidence"(Project number:2022YB09);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New Media Empowering the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of Ba Culture"(Project number:BCF2022YB15)

DOI: 10.23112/jgas25063007

Received: 15. Apr. 2025

Reviewed: 05. May. 2025

Accepted: 30. Jun. 2025

近十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基于 CNKI 知识图谱分析

陈海平

四川文理学院，达州，635000，中国

摘要

【背景】近十年来，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播与利用领域的学术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

【目的】本文旨在研究近十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方法】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软件检索 2015 年 1 月至 2025 年 3 月 CNKI 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相关核心期刊,通过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总结近十年来该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果】研究发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近十年来呈现出“数据整合与应用探索”—“互动与交流”—“活化与转化”的研究演进趋势。

【结论】新形势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将着力培养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队伍，形成多元化合作圈，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路径，构建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整合建设公共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创新平台，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非遗数字化；知识图谱；传播；非遗生态圈

ORCID: 0009-0000-8469-326X

通讯作者：陈海平；chenhaiping40@gmail.com

项目基金：川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2022 年度项目“文化自信背景下达州市法门武术非遗数字影像化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22YB09）；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 2022 年度项目“新媒体赋能巴文化创新传播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CF2022YB15）

DOI: 10.23112/jgas25063007

Received: 15. Apr. 2025

Reviewed: 05. May. 2025

Accepted: 30. Jun. 2025

1 引言

自1972年11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各缔约国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1992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采集全球重要的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影响下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展了“美国记忆”项目,通过数字技术采集、整理出了不同分类的数据库,并通过网络进行分享。随后,法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全球重要保护机构纷纷建成了特色鲜明的数字化线上数据库及网站。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现并挖掘本国的文化遗产资源。中国政府自2004年8月加入《公约》后,一直致力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播工作。2005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相应的档案和数据库。”中国非遗数字化建设就此展开。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王等,2023)。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作为研究数据来源,以主题为“非遗”、“数字化”进行检索,实践跨度为2015年1月1日—2025年3月31日,经过人工检查,数据排除非学术性文章,以及重复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287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有效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同时整理非遗数字化的研究现状发现,近十年中国非遗数字化研究学者涉及文化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与传媒、经济学、信息技术、法学、考古学、教育学等领域。文献发文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研究热度保持向上水平,但发文机构之间合作较少,领域内研究的学者持续增多,但持续研究的学者较少。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和突现词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非遗数字化研究的趋势呈现“政策导向”与“技术推动”双重特征,大部分研究都遵循“技术”与“政策”导向,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数据整合及应用探索—交互与传播—活化转化”的研究趋势发展。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对已发表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进行梳理总结,讨论中国近十年非遗数字化研究的阶段特点及研究热点,为学者们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近十年中国非遗数字化研究基本情况

2.1 文献时间分布

通过对筛选出的有效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数字化研究在近十年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如图1所示,尽管各年度发文数量略有波动,但整体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的趋势。从发文趋势来看,近十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5年至2017年,随着数字技术的初步成熟、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以及非遗产业市场化需求的增长,非遗数字化研究开始逐步兴起,研究内容呈现出起步探索的特征;第二阶段为2018年至2022年,这一时期是我国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快速完善的关键阶段,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遗的“线上传播”需求迅速增加,推动了虚拟展演、数字平台传播等新兴形式的普及,加之公众文化参与热情高涨,研究维度日益多元;第三阶段为2023年至今,随着国家层面出台《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规范》等政策文件,非遗数字化进入政策与市场共同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非遗内容创新日益活跃,如结合AI生成内容(AIGC)、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兴媒介手段进行二次创作与传播,大幅提升了公众关注度与传播效能;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5G、智能终端等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拓宽了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渠道和场景,带动相关研究进入高速增长期。



图 1：近十年非遗数字化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注：查询时间 2025 年 5 月 7 日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2.2 文献研究机构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对有效文献进行“合作机构”节点类型分析（图 2）发现，发文达 4 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共有 16 家，主要集中在华中师范大学 15 篇，中山大学 13 篇，云南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各 7 篇，华东师范大学 6 篇，安徽大学、天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各 5 篇，中南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各 4 篇，合作机构可视化图谱共有机构节点 (N) 219 个，连线 (E) 112 条，网络密度为 0.0047。可以看出，除了少部分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之外，总体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低，且分布多独立、不集中。



图 2：合作机构可视化图谱

图片来源：CiteSpace

2.3 高被引文献分析

研究文献的被引量被认定为该文献在领域内所做出的贡献大小的评价标准之一，同时也是文献领域内重要性与认可性的重要权衡标准。经统计，2015年1月1日—2025年3月31日期间高被引文献前十篇（如表1）。从统计表格中发现，高被引文献大多集中在2015—2016年，如黄永林、宋俊华、张旭、吕燕茹等学者的研究，以及2019—2021年（2篇），如马晓娜、薛可、谈国新等学者的研究。其中，黄永林的《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黄, 2015）虽发表在2015年，比同发表在2015年被引频率排名第三位的文章被引数高出了57次。该文章基于数字化浪潮对非遗保护与利用带来的影响，指出传统非遗保护方式存在“保护难、传播弱、传承断”的现实问题。同时指出，数字化技术具备强大的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和传播能力，对非遗的“记录性保护、再现性保护、传承性保护”具有显著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非遗数字化保护的主要方法：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数字档案建设与数据库平台搭建；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与互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在非遗展示中的作用；通过游戏、动漫、数字艺术等实现非遗资源的创新性转化和产业化利用。作者把握住了非遗保护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张力，回应了当代文化治理的重要议题。重点关注技术应用与现实挑战之间的落差，具有一定的政策与管理启发意义。此研究同时涵盖了非遗数字化的采集、传播、转化等多个环节，对理解“保护—利用”双重目标提供了系统化的视角，这也为近十年的非遗数字化研究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表1 2015年1月1日—2025年3月31日非遗数字化研究高被引前10文献

篇名	作者	刊名	发表时间(期)	被引量
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黄永林	文化遗产	2015(01)	364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现状	马晓娜、图拉、徐迎庆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	2019(02)	32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宋俊华、王明月	文化遗产	2015(06)	287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	宋俊华	文化遗产	2015(02)	21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挑战和新对策	薛可、龙靖宜	文化遗产	2020(01)	171
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	吕燕茹、张利	包装工程	2016(10)	166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	谈国新、何琪敏	理论月刊	2021(09)	158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述评	周亚、许鑫	图书情报工作	2017(02)	13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媒介研究	张旭	包装工程	2015(10)	11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刍议	谈国新、张立龙	图书馆	2019(04)	112

注：查询时间 2025 年 5 月 7 日

3 研究趋势与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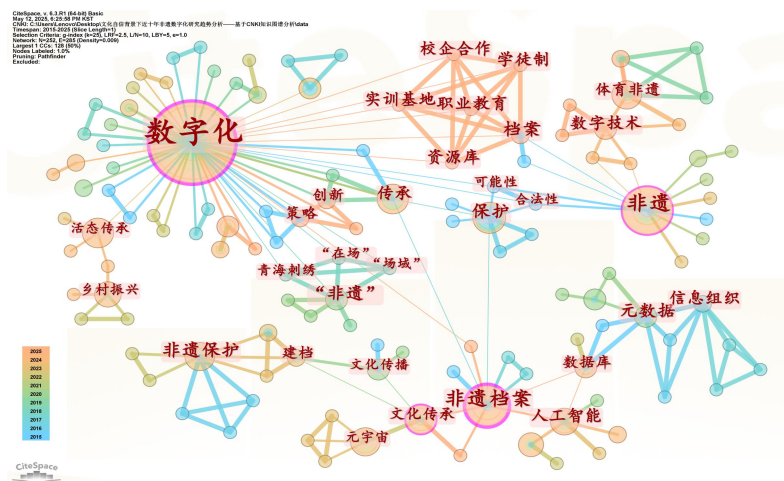


图 3：2015 年 1 月—2025 年 3 月中国非遗数字化研究共现图谱

图片来源：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对所处理数据中的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通过统计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形成可视化共现网络。根据图 3 显示，每个圆圈代表着一个关键词，圆圈越大，则表示这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通过梳理出的“201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3 月 31 日非遗数字化研究文献关键词频次 6 次及以上统计表”（表 2）我们可以发现“自 2015 年以来除去“数字化”与“非遗”之外，“非遗档案”、“保护”、“传承”、“活态传承”、“人工智能”是近十年非遗数字化研究的核心关键词。

通过词频分析，以“数字化”、“非遗”为中心，2015—2017 年间关键词涌现出“非遗档案”、“非遗保护”、“信息组织”、“元数据”等关键词；2018—2022 年间涌现出了“人工智能”、“体育非遗”、“建档”、“乡村振兴”等关键词；2023 年至今，出现了“活态传承”、“数字技术”、“具身认知”、“实现路径”等关键词。

表 2 201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3 月 31 日非遗数字化研究文献关键词频次 6 次及以上统计表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数字化	47	0.39
非遗	16	0.13
非遗档案	11	0.09
传承	7	0.01
保护	7	0.06
人工智能	6	0.03
活态传承	6	0.07

注：统计时间 2025 年 5 月 7 日

3.2 突现词分析

Top 1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5 - 2025
保护	2015	1.83	2015	2017	
传承人	2017	1.86	2017	2019	
口述史	2017	1.86	2017	2019	
“非遗”	2018	1.43	2018	2020	
图书馆	2016	1.25	2018	2021	
传播策略	2019	1.52	2019	2022	
非遗保护	2016	1.81	2022	2023	
元宇宙	2022	1.81	2022	2023	
乡村振兴	2022	1.32	2022	2025	
活态传承	2023	2.46	2023	2025	

图 4：2015 年 1 月—2025 年 3 月中国非遗数字化研究突现词前 10 序列图

图片来源：CiteSpace

为了对近十年的中国非遗数字化研究发展趋势进行解读，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筛选出的 287 篇有效文献进行突现词分析，得到 2015 年 1 月—2025 年 3 月非遗数字化研究的突现词序列列表（如图 4）。突现词是在一个时间段出现或使用较多、增长速度突然提高的关键词或专业术语，突现度越高，越能代表这段时间内研究中心与研究发展的趋势。我们通过图 3 发现，围绕“非遗”、“数字化”为中心自 2015 年开始，出现了“保护”、“传承人”、“口述史”、“图书馆”、“传播策略”、“非遗保护”、“元宇宙”、“乡村振兴”、“活态传承”等突现词。根据突现词分布，将近十年非遗数字化研究趋势划分为三个阶段。

3.2.1 第一阶段（2015 年至 2017 年）数据整合及应用探索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在经过非遗数字化十年建设后，非遗数字档案、数据开始集中、系统化整合在库到应用探索阶段，同时反思非遗本身的活态性与无形化决定了其传承的难度。通过这一阶段的突现词可以发现，非遗数字保护与利用的反思与对策，以及技术支撑下非遗数字化应用探索成为这一时期的关注热点。

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反思与对策。宏观层面。有学者总结了我国非遗数字化建设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其问题。如宋俊华和王明月指出通过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应用和大数据分析，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但数字化保护存在“重技术、轻文化”现象（宋、王，2015）。王明月提出“数字化保护的基础理念、语义设计、分类与评价体系、组织规范、社会效益均存在着文化风险”（王，2015）。对此，宋俊华提示数字化只有真正内化成非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才能真真正正发挥确保非遗生命力的作用（宋，2015）。宋丽华等学者通过分析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站的基础上，提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平台的建设策略及模型（宋等，2015）。与此同时，赵越和周耀林通过梳理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后指出“非遗数字信息组织、管理成为关注的焦点；非遗数字化保护理论与知识体系亟待构建等特点”（赵、周，2017）。以此为我国数字化发展提供借鉴。

地方层面。非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多数学者这一阶段将研究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非遗数字化实践应用。研究在关注非遗保护和传承同时，同步考虑了如何数字化如何因地制宜的问题。如贵州在少数民族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数字化进程尚处于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初级阶段，王伟杰、肖远平提出启动“贵州非遗技艺工程”，共享共建少数民族非遗数据库（王、肖，2018）。广西虽然形成了良好的非遗保护局面，各级保护组织与民间都对非遗资源进行了挖掘与保护，但存在已建成的非遗数字化资源与非遗资源总量比例不平衡等问题，提出了梳理正确的保护理念、网上数字化体制机制、

实现多样性的数字化保护手段的建议(孙等, 2017)。青海刺绣面临传承人大量减少的危机, 数字资源库建设处于空白的现状。张效娟提出提供全面数字化保护服务, 搭建宣传、展示平台的建议(张, 2018)。

数字技术支撑下非遗数字化实践探索。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虚拟成像等数字技术与非遗的融合探索, 如何科学利用数字技术, 实现非遗可持续化保护与发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有学者指出有效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平台,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 能拓展传播领域, 扩大社会影响(王, 2017), 构建“互联网+”基础之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场景将是一条有效的文化发展途径(权, 2017)。同时, 有学者发现新媒体技术的创新型应用不仅有利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 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吕、张, 2016), 利用新媒体的多元化的宣传形式能有效扩大非遗的群众认知度。在具体实践应用探索方面, 何晓丽、牛加明通过利用三维扫描与数字摄影测量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建造了肇庆端砚的真实三维文理的虚拟图像, 探讨三维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传承、发展中的作用(何、牛, 2016)。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不单是对现有实体的保护与记录, 通过探索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具体实践应用, 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非遗资源丰富、对其保护与传承研究, 不断深挖其文化价值, 实现活态传承, 延续文化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3.2.2 第二阶段(2018年至2022年)交互与传播期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关注、相关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 同时面对数字化对各行业的影响加剧, 数字传播成为非遗传承和保护的核心任务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使得更多不同学科学者投入到非遗数字化研究之中。整理发现, 这一时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集中于“交互与传播”, 其研究呈现出“由展示向体验、由单向传播向多元参与”转变的趋势, 逐步进入融合新技术、多平台、深互动的“在场”传播阶段。

首先, 从传播形式看, 短视频、游戏化、虚拟现实等新媒介成为主流手段。如徐芳等研究指出, 短视频凭借其碎片化、快速传播特性, 被广泛应用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中, 形成了“选题—制作—发布”的标准流程, 有效提升了文化资源的可达性和趣味性(徐, 2022)。王娜娜等研究以秦淮灯会为例, 提出通过非遗数字游戏化策略, 引导用户主动接触文化内容, 实现“寓教于乐”的传播效果(王等, 2022)。

其次, 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体验技术成为了互动传播的核心路径。苗秀等提出, 虚拟现实游戏借助其沉浸性与交互性, 增强非遗技艺传播的参与感和真实性, 构建出以“真实性—游戏性—可用性—情感性”为要素的用户体验设计框架, 推动传统文化在数字环境中获得新生(苗等, 2022)。

再次, 交互传播强调“本真性”与“在地性”的数字再现。欧阳长铨等在对酉阳“三棒鼓”的研究中提出, 应在尊重非遗本体特征基础上, 结合数字建档、沉浸展示与场景互动, 实现文化活态化呈现(欧阳、李, 2021)。而申若希等对北京雕漆的元宇宙融合研究, 尝试将传统手工艺与虚拟空间对接, 使“口手相传”得以延展至跨地域、跨媒介的数字空间(申、吕, 2022)。

最后, 研究理念也经历从“技术导向”到“用户中心”的转变。非遗传播不仅关注内容呈现, 更注重用户的认知习惯、行为动机与文化情感。权玺在“非遗数字化路线图”中总结了传播路径由“在库—在线—在场”的演进过程, 反映出技术、制度与用户参与三者协同发展的格局(权, 2022)。

3.2.3 第三阶段(2023年至今)活化转化期

随着中国政府把文化数字化提升到战略高度,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行业标准的出台, 这一时期非遗数字化研究进入活化转化期, 呈现出技术驱动的创新转化路径与传播场域的融合与价值转化路径并进的趋势。

技术驱动的创新转化路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契机。聚焦前沿数字技术对非遗保护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人工智能与AIGC能有效赋能非遗生成与再创作。如李加和张景发现通过AIGC不仅为蜀绣带来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更提升了文传产品的科技精神与内涵(李、张, 2024)。蔡雨珂和张军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支持非遗活态化交互、多元化展示等优势, 提出完善非遗文化数字化展示空间(蔡、张, 2024)。元宇宙、VR/AR沉浸式体验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口头文学

保护与传承要求严苛，探索以元宇宙为视角从内容、场景与交互制定科普 VR 设计方案，为口头文学类非遗提供新思路。刘中华认为数字非遗登陆元宇宙，可最终实现人与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刘、焦，2023)。数字孪生、大数据与数字档案构建非遗数据生态。张彧梳理了非遗档案数字化的关键技术，包括数字化采集、存储、管理、检索以及 VR、AR 等创新应用，展望了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非遗档案的融合趋势(张，2025)。这些研究强调技术不仅是保护工具，更是内容再生、价值放大的新动能。

传播场域的融合与价值转化路径。随着国内外愈发意识到数字传播在非遗保护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研究注意到非遗与社会、市场、用户之间的融合机制，特别是在媒介、产业和认知维度上的互动。具体包括：非遗与文化创意、文旅产业融合，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价值转化。如李玮玮提出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产品融合的新方法，对非遗文化传承和创造性转化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李，2024)。翟姗姗等学者研究关注文化旅游-非遗智慧符合和文旅研学-非遗融合服务两类场景中的技术运用及服务创新(翟等，2023)。基于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的青年传播机制与认同建构。岳威等学者为瑞东非遗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数字化传播，以安徽花鼓灯非遗文化为例，研究了青年群体的数字体验需求，分析出影响青年群体非遗数字化体验需求主要在视觉体验、功能体验和知识反馈三大维度(岳等，2023)。权玺认为非遗数字化以数字增能的方式实现了非遗新青年自我效能，人际交互和社会观照与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之间同频共振(权，2024)。传播场域的融合与价值转化路径主要关注的是非遗的“活态”传播与大众化参与，使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实现可持续的“再生活”。

第三阶段截止到目前，非遗数字化研究正从“记录保护”迈向了“生态构建”，并形成了“技术—内容—平台—应用”的多维协同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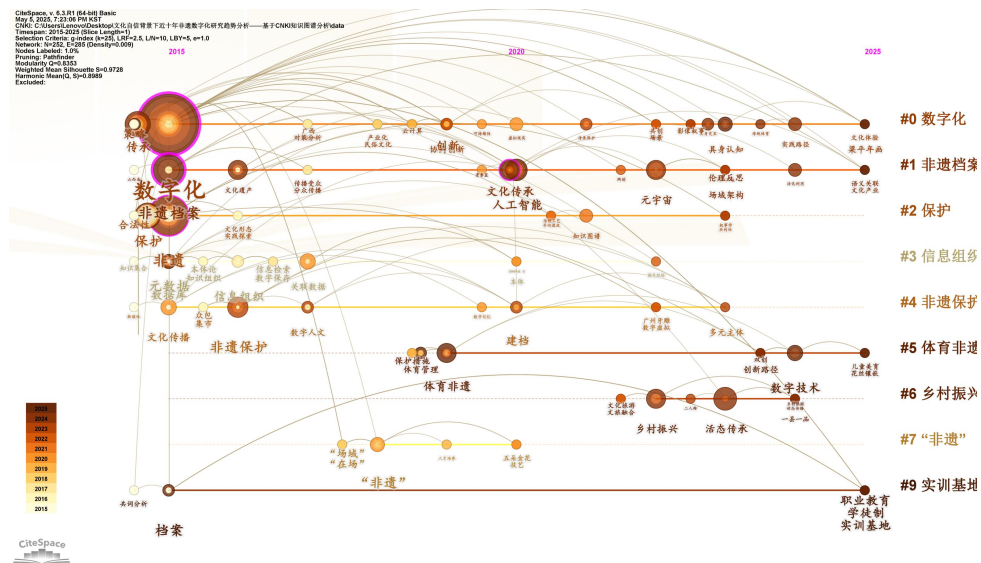


图 5：近十年来非遗数字化关键词时区聚类图

图片来源：CiteSpace

4 非遗数字化未来研究趋势

非遗数字化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确保其能够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同时，通过非遗数字化的转化与应用，能够使更多民众意识到其重要性，并能自觉参与到其中，达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当前，中国非遗数字化在文化自信建设背景下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部分层面亟待研究与探索。

4.1 培养复合型非遗人才队伍，形成多元化合作圈层

通过合作机构网络分析已知，近十年，中国针对非遗数字化的研究团队与合作机构主要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为主的两大研究圈构成。其中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不仅与其校内研究机构如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形成合作网络，同时与中国民俗学院、中国新文学学会建立合作，还与芬兰图尔库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进行国际化研究合作。

但从整体上看，研究机构合作不紧密表现为是资源分散、合作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学科壁垒等方面，而非遗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整和专业的非遗人才队伍日渐凋敝则是问题的核心。因此，首先需要不断提高非遗学科建设的专业性与可持续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院校非遗学科双导师制，促进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同时举办全国非遗政策与实务师资培训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丰富学术科研成果，以完善非遗学科体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其次，应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利用互联网平台，开设非遗网上公共课堂、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培训班等。为更多基层非遗保护工作者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同时，支持高校开设非遗相关专业专业，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张，2025)。最后，深入推进非遗传承人的技艺研究与应用相结合。组织与协调非遗传承人、应用单位进入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进行专业知识学习与技艺的研究与创新应用开发，有助于推动非遗创性发展。同时实现人才共享、资源共用、多领域融合的多赢局面。

4.2 拓展非遗数字化传承路径，构建良好的非遗生态圈

数字技术融入非遗保护与传承全过程，重塑了保存模式，重构了传播场景，创新了产业形态，拓展了传播渠道(谭、李，2024)。非遗其根本以人为载体，有特定的立体语境中如群体的生活经验、民族文化传统、群体记忆以及社会生产实践所组成。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于原生态形态。而根据之前的关键词时区聚类图和突现词序列表可以看到，有关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数字技术是最主要的媒介手段，活态传承是其根本，非遗数字化多场景应用是拓展途径。近几年的高频词“活态传承”、“乡村振兴”、“文化体验”等可以充分说明，可以推测出“数字技术”赋能下、非遗的“活态传承”、探索多领域应用都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

在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正不断迈向系统性、生态化的新阶段。未来非遗数字化传承应从路径创新与生态协同两方面协同推进，以构建一个多元共生、可持续演化的良性生态圈。

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展非遗数字化传承路径。一是推动“技术-内容-场景”深度融合，充分利用VR/AR、AI、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将非遗的音、像、形等元素以多模态形式记录、再现与传播，从“留存-传播-互动”全链条提升传承效能。二是发展“平台+社群+产品”的综合型非遗数字平台，实现非遗资源从数据资产到数字消费品的高效转化。三是激活虚拟空间中非遗内容的创造潜能，鼓励数字创作者、非遗传承人、平台用户等多方主体参与非遗叙事、展演和再创作，推动“众创型”传承机制成型。

另一方面，要构建系统性、互嵌式的非遗数字生态圈。一是完善以“非遗资源数据-利益相关者数据-技术设施-数据环境”为核心要素的生态系统结构，实现从信息链到信息生态的转型升级。二是强化跨学科、多领域协作机制，建立文化学、信息学、传播学等融合参与的协作网络，形成跨部门、跨平台、跨行业的协同生态。三是通过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文化引导等手段，营造“重人本、重文化、重原创”的价值导向，为非遗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提供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非遗数字化的发展将由“单一保护路径”向“多元共建生态”转变，唯有拓展丰富、创新开放的数字传承路径，并构建具有内在生长力的非遗数字生态系统，方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语境中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4.3 整合建设公共非遗数字化创新平台，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瑰宝，承载了 56 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它融于我们的生活中，通过声音、视觉艺术进行展现，凭藉口耳相传进行着世代传承，维系着中华“文化链”。

历经了多次工业革命，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数字技术、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众多技术手段对非遗的传播中凸显关键作用，非遗也由“在库”静态留存走向“传播”动态体验展示。在当下不同平台上，非遗不仅形成了一条可循环的产业链，更让非遗有了新的可持续空间。但由于各平台各自运行规则，仍需警惕与非遗保护初衷相悖的行为出现，同时需要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非遗可持续发展之间进行平衡。为了使非遗数字资源有效整合，避免因为传承人或持有者自身数字应用技能不足，导致传承断链的情况出现，积极构建以数字化应用技能的培训与普及也是势在必行。那么，整合建设公共非遗数字化创新平台也是未来观点之一。

数字技术正快速影响并改变着各行业的产与服价值链。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新质生产力等新技术革命的提出，中国进入了全新数字化时代。非遗的有效传承不仅有助于提升非遗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自觉性，而且有助于提高民族文化竞争力(王等，2024)。非遗数字化研究在文化自信价值观和数字强国战略下，正朝着多元化、深度化和融合化方向发展。聚合多方资源对非遗进行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 张或.(2025).我国非遗档案数字化研究现状与前瞻.山西档案(03),165-167.
DOI:CNKI:SUN: SXDA.0.2025-03-049.
- 王克岭、段玲、黄妹菡.(202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路径探讨——基于政策主导性与文化自觉性的视角.科学决策(08),144-154.
DOI:CNKI:SUN: KXJC.0.2024-08-009.
- 蔡雨珂、张军.(2024).人工智能驱动下非遗的数字化传播.传媒(15),49-51.
DOI:CNKI:SUN: CMEI.0.2024-15-016.
- 权玺.(2024).和而不同异而相融:增能理论视域下“非遗新青年”的数字行动逻辑与价值共创体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02),52-59.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40226.001.
- 李加、张景.(2024).美育视阈下的蜀绣 AIGC 创新设计与数字化推广研究.包装工程 45(04),485-490.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4.04.054.
- 李玮玮.(2024).文旅融合背景下坭兴陶文化与数字文创的融合设计研究.包装工程 45(02),460-471.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4.02.051.
- 岳威、马星孟、许子怡、兰梦、李硕.(2023).面向青年群体的非遗数字化体验需求研究.包装工程 44(24),66-74.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3.24.008.
- 翟姗姗、查思羽、郭致怡.(2023).面向文旅融合发展的非遗数字化技术体系构建与服务场景创新.情报科学 41(07),32-39.
DOI:10.13833/j.issn.1007-7634.2023.07.005.
- 王洪坤、韩玉姬、梁勤超、李源.(2023).从“失位”到“适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困境及其纾解.体育科学 43(02),33-41.
DOI:10.16469/j.css.202302004.
- 刘中华、焦基鹏.(2023).元宇宙赋能数字非遗的场域架构、关键技术与伦理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3(01),19-29.
DOI:CNKI:SUN: ZJDX.0.2023-01-002.
- 欧阳长铨、李慕晓.(2022).酉阳“三棒鼓”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承研究.四川戏剧(11),130-132.
URL:<https://chn.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3&filename=SCXJ202211031&uniplatform=OVERSEA&v=ytPry6jEop5dAmzvWjLKEmONgZCKwmR453Vk-5Mw9tpGVRaBAjQWUX8yEfr7nXNo>
- 王娜娜、乐凤、靳紫微、高秦艳.(2022).基于金陵节庆文化的非遗数字游戏化策略探究——以南京秦淮灯会为例.包装工程 43(24),420-430.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24.050.

- 徐芳、汪紫颖、张慧敏.(2022).短视频在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中的应用.档案与建设,(09),51-54.
DOI:CNKI:SUN:DAJS.0.2022-09-010.
- 权玺.(2022).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路线图及其未来发展逻辑.中国文艺评论(08),27-38.
DOI:10.19324/j.cnki.zgwypl.2022.08.008.
- 苗秀、侯文军、徐雅楠.(2022).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非物质化遗产数字化创新研究.包装工程 43(16),303-310+409.
DOI:0.19554/j.cnki.1001-3563.2022.16.035.
- 申若希、吕林雪.(2022).元宇宙在北京雕漆数字化的创新融合应用研究.包装工程 43(S1),283-288.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S1.047.
- 王伟杰、肖远平.(2018).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及发展对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04),119-123.
DOI:10.13501/j.cnki.42-1328/c.2018.04.017.
- 张效娟.(201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以青海刺绣艺术为例.青海社会科学(03), 201-204.
DOI:10.14154/j.cnki.qss.2018.03.029.
- 权玺.(2017).“互联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的新场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181-184.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7.06.027.
- 王龙.(2017).“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求索(08),193-197.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7.08.028.
- 赵跃、周耀林.(2017).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综述.图书馆(08),59-68.
URL:<https://chn.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7&filename=TSGT201708011&uniplatform=OVERSEA&v=r-knjXyonljQIeLR-hzvWzTPU2XvBn1scbZwqj2aRNIB1eUNfpWCyWqHVvjUI3Ln>
- 孙传明、程强、谈国新.(2017).广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及对策分析.广西民族研究(03),124-132.
DOI:CNKI:SUN:MZYA.0.2017-03-016.
- 吕燕茹、张利.(2016).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包装工程 37(10), 26-30+10。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6.10.008.
- 何晓丽、牛加明.(2016).三维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肇庆端砚为例.艺术百家 32(03),231-233.
DOI:CNKI:SUN:YSBJ.0.2016-03-040.
- 宋俊华、王明月.(2015).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文化遗产(06),1-9+157.
DOI:CNKI:SUN:WHYA.0.2015-06-002.

王明月.(201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风险与路径反思.文化遗产(03),32-40.

DOI:CNKI:SUN:WHYA.0.2015-03-009.

宋俊华.(2015).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文化遗产(02),1-8+157.

DOI:CNKI:SUN:WHYA.0.2015-02-001.

黄永林.(2015).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01),1-10+157.

DOI:CNKI:SUN:WHYA.0.2015-01-001.

宋丽华、李万社、董涛.(2015).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知识整合平台建设.图书馆杂志,34(01),73-81.

DOI:10.13663/j.cnki.lj.2015.01.011.

免责声明：所有出版物中包含的声明、观点和数据仅代表个人作者和贡献者，而非 JGAS 和/或编辑。JGAS 和/或编辑对因内容中提及的任何想法、方法、说明或产品而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